



林玉玲《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
家园回忆录》中的家园书写

Homeland Writing in Shirley Geok-lin Lim's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

叶楚儿

SAMANTHA YAP CHU ER

15ALB05782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19

林玉玲《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中的家园书写

叶楚儿

拉曼大学中文系

二〇一九年四月



林玉玲《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
家园回忆录》中的家园书写

Homeland Writing in Shirley Geok-lin Lim's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

叶楚儿

SAMANTHA YAP CHU ER

15ALB05782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19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叶楚儿 SAMANTHA YAP CHU ER

学号：15ALB05782

日期：2019年3月29日

论文名称：林玉玲《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中的家园书写

学生姓名：叶楚儿

指导教师：黄丽丽 博士

校院系：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林玉玲在《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之中重现了对家园的记忆和情怀。在这部回忆录里面，林玉玲为读者呈现了自己在众多物质家园中的各种回忆，其中包括有关亲情、爱情、友情、移民等人生经历。在这些物质家园当中，林玉玲也逐渐寻得能够让她精神上有所寄托的精神家园。林玉玲经历了离家——寻家——归家的过程之后，也逐步建构起了她的身份。本论文旨在通过林玉玲在回忆录中的家园书写，探讨林玉玲如何定义家园及其在家园的主题上如何叙说她的故事，同时彰显离散经历对于林玉玲的身份建构起了什么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林玉玲、《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家园书写、离散、身份认同

致谢

161 天，原来这份论文从开始到结束只历时 5 个月又 10 天。不知不觉地，这份论文一章一节地写完了，三年时光也一天一天过去了，一切即将来到尾声。

首先，我要感谢上帝的带领与恩赐。圣经第二章十节：“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提醒着我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莫忘初心。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让我从小就知道学业固然重要，但拥有好人品更难得。在我的学生生涯之中，他们更重视的是我的健康，关心的是我有没有好好休息。我要感谢父母总是信任且支持着我的所有决定。感谢我两个弟弟，哪怕是感到一点点的压力，他们总有办法逗我开心、逗我笑。

我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黄丽丽博士。她的耐心和用心一直推动我努力成为更好，勉励我去追求进步。我要感谢丽丽老师给予的建议，不停开拓我的视野和思考能力。本论文得以完成，还得感谢丽丽老师的指导和修正。

最后，我要感谢 Grizzly 的主人和 Dora 的主人。这份论文的背后，是上百杯的咖啡和奶茶日日交替着喝、无数个夜晚慢慢地熬。但，因为有你们，咖啡奶茶不是我一个人喝、熬夜不是我一个人熬。就算是熬夜，我们也是笑着熬；就算是面对压力，我们依然彼此鼓励着、共同奋斗着。大学生涯里各位并肩作战的同学们，我对你们心存感激的。你们的好，我会铭记于心。在此祝福大家一生平安喜乐！

目次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4
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6
第四节 论文框架	9
第二章 林玉玲《月白的脸》中的家园书写	10
第一节 林玉玲对家园的定义	10
第二节 林玉玲《月白的脸》中的家园叙事	15
第三章 林玉玲的离散经历与多重身份	23
第一节 林玉玲的血缘、族群与国别身份	24
第二节 林玉玲的附属身份	29
第四章 结语	33
参考文献	36

第一章 绪论

Tim Cresswell 在《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中提出：“对许多人而言，有关地方及其对人类的重要性，最熟悉的例子就是家的观念”（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译，2006：42），足见家园对人类的影响之深远，因此本文将家园书写为视角去探讨林玉玲从身为华裔马来西亚人而后成为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转换中，对家园的情怀及其表现于作品中的家园书写。

第一节 研究动机

因为政治因素的介入，“马华文学”在定义与属性层面来说已经相当复杂。因此，当我们在谈论“马华文学”与“马英文学”时，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因为定义范围模糊而出现重叠的情况。若不把“马华文学”与“马英文学”的定义厘清，林玉玲这位作家以及她的作品就会陷入“既非此非彼，又亦此亦彼”的窘况。

首先，马来西亚文学界对“马华文学”的定义本来就持有争议。“马华文学”在八、九十年代以前被普遍理解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换言之，当时的“马华文学”所指的仅是以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后来，黄锦树建议把“马华文学”原来所指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修订成“马来西亚华人文学”

（黄锦树，1990：3）。其实，张锦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因为反对将“马华文学”定位为华文文学，而提出了以“华裔马来西亚文学”（简称“华马文学”）来代替，原因是并非所有马来西亚华裔都会说华语写华文，或以华文写作（张锦忠，2008：3）。不管是黄锦树的“马华文学”或是张锦忠的“华马文学”，两者所提出的论点其实是有共通之处的，就是认为马来西亚华裔的写作，无论什么语言，都应该包括在内。参照黄锦树和张锦忠的说法，林玉玲的作品就应该被纳入马华文学的领域。但，林玉玲更普遍被视为马英文学的作家。

根据林加乐的界定，“马英文学”指的是“马来西亚英文文学”，其涵盖范围有二。狭义上是指马来（西）亚人（指土生土长于马来亚或马来西亚者或永久居民）的英文作品；广义上则是指前述含义之外还包括马来（西）亚人（指土生土长于马来亚或马来西亚者或永久居民）所写而后译成英文的作品（林加乐，2003：115）。五十年代起，马英文学的知名作家包括余天鸿、黄培南、叶贝思（Beth Yahp）、欧大旭（Tash Aw）等，林玉玲也是马英文学作家中受到了国际瞩目的其中一员，更被林加乐列为马英文学七杰之一¹。

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1944-），1944年12月27日出生于英属马六甲，在11岁之前已立志成为诗人，并开始写作。林玉玲曾在《马六甲时报》（*Malacca Times*）发表诗作，当时的她年仅10岁。1980年，36岁的林玉玲出版了第一部诗集 *Crossing the Peninsula and Other Poems*（《跨越半岛》），并获颁“大英国协诗歌奖”（Commonwealth Poetry Prize）。1996年，林玉玲在美国出版了自传小说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American Memoir of*

¹ 林加乐所列的马英文学七杰分别是余天鸿（Ee Tiang Hong）、黄培南（Wong Phui Nam）、李国良（Lee Kok Liang）、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罗亿·傅南多（Llyod Fernando）、马谅（KS. Maniam）和纪传财（Kee Thuan Chye）。

Homelands（2001年由张琼惠翻译成中文版《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下文称《月白的脸》），更于同年获颁“美国国家图书奖”（American Book Award）。《月白的脸》中记载了从她在马来（西）亚的童年、少年时代，直至她赴美后的生活。这部回忆录主要围绕着家园与离散的主题，叙述着林玉玲生命中两个家的故事。

据《月白的脸》的叙述，林玉玲是一位出生在马六甲的美国合法公民，是一位集东方色彩与特色的娘惹²。她自小与社会格格不入，是一位不愿意依附男人的女性主义者。笔者认为她刚烈的性格是因为亲身经历过马来西亚众多的重要时期，包括日据时期、英殖民时期、马来西亚种族动乱的“513事件”、马来西亚独立建国等。正是她如此独特的身份背景，才造就了她与众不同的人生。笔者对于这位经历过马来西亚动荡时期的作家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其作品去理解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成长轨迹。再者，尽管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同与肯定，本地学者对林玉玲的探讨与分析似乎不多。因此，笔者也希望能够通过本文的研究，以本土的视角去探讨林玉玲在这部回忆录中的家园书写。

林玉玲《月白的脸》记录着她一生迁徙的历程，从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到吉隆坡，再到美国的波士顿、布鲁克林、威阙斯特等。文中也记述了她在故乡接受英殖民教育，进而接触中国、葡萄牙、英国及美国的混杂文化。笔者因此希望通过研究《月白的脸》，了解林玉玲的多重身份以及马来西亚华人的多重属性。

² 峇峇娘惹（Baba Nyonya），又称海峡华人（Straits-born Chinese）或土生华人（Peranakan Chinese），已同化于马来文化，男性称“峇峇”（baba），女性称“娘惹”（nyonya）。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林玉玲出版过大量的诗集，包括 *No Man's Grove*³、*Monsoon History*⁴、*What the Fortune Teller Didn't Say*⁵等；自传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月白的脸》）；小说作品则有 *Joss and Gold*⁶、*Sister Swing*⁷、*Princess Shawl*（《魔法披巾》）等。在众多作品中，笔者之所以选择研究林玉玲《月白的脸》，是因为这部作品让笔者感受到了一位离散者的无助与迷茫，也体会到流浪者的矛盾心理。

本论文的题目是《林玉玲〈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中的家园书写》。笔者将以张琼惠于 2001 年翻译的中文译本为主要参考，也会在必要时参考英文原文。笔者将针对林玉玲在马来（西）亚以及美国两处的书写分析其家园的定义与观念，并从中探究林玉玲对两个家园抱着什么样的态度与感情。

回忆录是一种自传式的书写，它捕捉着作者过去的某些焦点或重要的时刻，包括特别的事件与场景（朱雯娟，2009：1）。自传式小说既有真实的成分，亦有虚构的元素，但我们也不可否认作者对某件事、某个空间或某段时间的情感

³ 译注：林玉玲 1985 年出版的诗集 *No Man's Grove*，尚无中文译本，仅其书名被译为《无人林》或《林园禁地》。

⁴ 译注：林玉玲 1994 年出版的诗集 *Monsoon History*，尚无中文译本，仅其书名被译为《季风史》、《时当雨季》或《季候风历史》。

⁵ 译注：林玉玲 1998 年出版的诗集 *What the Fortune Teller Didn't Say*，尚无中文译本，仅其书名被译为《算命先生没说的》或《算命先生未泄露的天机》。

⁶ 译注：林玉玲 2001 年出版的首部小说 *Joss and Gold*，尚无中文译本，仅其书名被译为《馨香与金箔》、《神像与黄金》或《香与金》。

⁷ 译注：林玉玲 2006 年出版的小说 *Sister Swing*，尚无中文译本，仅其书名被译为《鞦韆妹妹》或《三姊妹》。

叙述。回忆录是“个人化写作”，也是“代言人写作”的一种（邓全明，1998：47）。换言之，一部回忆录不仅包含作者自身的经验、情感和愿望，它还可以让作者站在民族、国家、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去反映民族、国家以及人民的愿望（邓全明，1998：47）。

为了研究回忆录中的社会历史背景，笔者采用了社会历史批评法，从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历史事件等方面去了解回忆录中所记载的事迹。社会历史批评法强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认为文学是再现生活并为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形成的，因而文学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社会认识功用和历史意义”（童庆炳，2003：365）。笔者希望能够根据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去解析林玉玲对马来西亚的情怀。

针对回忆录中的家园书写，笔者则运用了心理批评法，尝试探讨林玉玲的身份认同、离散经验和家园意识等议题。离散一词源于希腊文“diasperien”，是由“dia”（跨越）和“sperien”（耕种或散播种子）两个词根所组成的。这个课题最典型的代表为犹太人。他们认为只要自己不是居住在耶路撒冷（包括以色列境内），便会被视为离散者。作为离散者，林玉玲在回忆录中除了记述了地理位置上的跨越，也叙述了文化层面上的跨越。笔者希望解析作者在离散经历中所面对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交互的过程，并从中分析作者在文本当中如何把转变过程的所有情感呈现出来。笔者也将会运用霍米·巴巴有关身份建构的理论以及其他学者对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的研究成果去论析林玉玲的离散经历如何影响她的身份建构。

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关于林玉玲的文学作品，中西学术界的学者都尝试用各种角度去研究以及论述。笔者着重于前人对林玉玲《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的研究现状，尝试通过查阅与搜集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加以整理归纳，现对有关的文献内容作如下分析：

一、林玉玲文学作品中的离散书写

身为一位亚裔美籍作家，林玉玲的作品中常出现离散、游离的概念。针对林玉玲的离散书写，李有成《回家：论林玉玲的回忆录》将离散定为研究的出发点，以若干与离散有关的议题探讨文本，并在文中特别指出《月白的脸》是“批判性离散文化政治”的文本。黄燕祺在硕士论文“Home and Exile: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the Prose Writings of Shirley Geok-lin Lim”，根据马来西亚的社会历史背景，针对林玉玲离散书写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以及文化同化两大议题作分析。周婉淑的硕士论文“Decoding the Enigma of Diaspora: Dialogue Between the Self and Home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China Men* and Shirley Geok-lin Lim's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以漂泊离散的观点，将林玉玲所撰写的回忆录解读成一趟寻根之旅，也是一场自我与家对话的契机。有别于其他学者的研究角度，庄祐纶的硕士论文“Formation of Transnational Identity in Shirley Geok-lin Lim's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Memoirs of an Asian American Woman*”特以跨国别身份的观点撰文研究林玉玲的回忆录，分别从地理位置、教育体制、疏离经验、多元化互动等视角去阐释林玉玲在文化转移的过程中如何建构她的

跨国别身份。Chingyen Yang Mayer 的论文“Entangled Allegiances and Multiple Belongings in Shirley Geok-lin Lim’s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 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主要通过文本的进展探讨其中离散、身份与家庭意识、女性主义等主题。

二、林玉玲《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的文本分析

虽然大部分学者选择了针对林玉玲回忆录中的离散主题做深入探讨，但同时也有部分学者会采用不同的角度对这部回忆录进行分析。张燕在《一位华裔马来西亚女性的生命书写——解读林玉玲〈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中则是分别对林玉玲与性别歧视的抗争、与种族歧视的抗争、对英殖民教育的批判、与西方的种族歧视抗争四个方面作论述，从生命书写的角度深入解读与阐释林玉玲的回忆录。

三、林玉玲文学作品中的娘惹文化形象

此外，张燕也曾撰《论林玉玲文学作品中的娘惹文化形象》，试图从娘惹的语言、服饰和饮食三方面，对林玉玲的作品进行探讨与解读。文末，张教授不仅肯定了林玉玲作品中所展现的本土特色与东方色彩，还强调其作品正是东方文学、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价值所在。

四、林玉玲作品中的镜像设置和视觉批判

赵庆庆在论文《北美华裔女性文学：镜像设置和视觉批判——以刘绮芬、陈迎和林玉玲的作品为例》中运用法国结构精神分析学的镜像理论去探讨林玉玲回忆录中“女儿”与“母亲”之间“看”与“被看”的互视关系以及过程。赵庆庆也在该文里批评了林玉玲与其他两位研究对象的视觉批判的局限，认为

林玉玲虽是西方女权主义者却在文学表现上剥削了母亲的形象，同时也把母亲再度他者化了，留下的只有没有精神的躯壳。

五、林玉玲回忆录的书写

朱雯娟撰写《林玉玲〈月白的脸〉中回忆录的书写是社会空间的产物》，是根据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的空间理论，从回忆录的书写特质这个角度去分析这部作品。

六、林玉玲的诗学研究

张锦忠撰写《流动与游离，或，交换与改变（之必要）：林玉玲的离散诗学》，文中从离散的概念出发，指出林玉玲对散居华人的后殖民和后现代认同与属性的关注，并同时彰显语言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变换与交易关系。刘锦珠在硕士论文“Finding Her Own Voice: Language, Identity and Gender in Shirley Geok-lin Lim's Poetry”对林玉玲诗作中的语言、身份与性别三方面探讨其中的离散主题。Agnes S. K. Yeow在“‘Transformed by the Land's Rolling Green’: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Poetry of Shirley Geok-lin Lim”聚焦于林玉玲诗作中的生态意识作研究，探讨诗中有关生态、地域、自然等主题。

综上所述，学者多以离散的观点探讨林玉玲的回忆录。此外，部分学者选择了直接分析文本，根据文本情节的发展作研究。最后，较为特别的研究视角包括娘惹的文化形象、镜像设置和视觉批判、回忆录的书写以及诗学研究。由此可见，众多学者鲜少采用家园意识的视角对林玉玲的家园回忆录作解读与分析。因此，笔者选择尝试通过本文探讨林玉玲对家园的意识与情结。

第四节 论文框架

本论文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绪论。绪论中包括研究动机、研究范围与方法、前人研究回顾以及论文框架。

其次，笔者将在第二章探讨林玉玲对家园的定义，再细述林玉玲在回忆录中的家园叙事。本章节会通过文本中的叙述脉络去探讨林玉玲从出生、成长、移居等经历中如何对家园的概念有所转变。笔者将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法去探讨当时的历史背景如何影响马来西亚华人对这片土地的情感。

接着，本文第三章将采用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针对身份建构的说法讨论林玉玲的身份建构，并且会从血缘、族群、国别以及其他附属身份各方面探讨林玉玲多重身份的建构。此外，笔者将运用心理批评法，讨论其回忆录中有关身份的课题。

最后，笔者将于第四章对本文的内容重点进行梳理与总结，从中了解林玉玲在书写回忆录时的家园意识以及离散经历对她生命的影响。

第二章 林玉玲《月白的脸》中的家园书写

林玉玲似乎毕生都与家园意识这一课题密切相关。在林玉玲离家之前，她已受尽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折磨；离家之后，她开启了遥遥无期的寻家历程；寻家之际，她一边审视着家园的人、事、物，一边面对无家的悲凉；归家之时，伴她一生的心结也逐渐得以释怀。在每个阶段，林玉玲对家园的情感都有不同，以下对这些情感转变进行探讨。

第一节 林玉玲对家园的定义

何谓家园？王欣提出家园可以分为物质与精神两种性质：物质家园便是具体地理意义上的生活环境，是与家乡、故园同义的空间概念；精神家园则指抽象精神意义上的生活方式与价值标准，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家庭（王欣，2016：1）。参照王欣的界定，林玉玲曾拥有过多个物质家园。林玉玲在回忆录首章记载道：“我来自马六甲，一个位于赤道以北二度的小镇，然后我自己搬到新英格兰、搬到布鲁克林、搬到富裕的纽约市郊威阙斯特郡，现在又搬到南加州……”（林玉玲，2001：45）。以上，林玉玲对自己居住过的地方做了简单的概述，但在阅读整部回忆录后，读者可得知林玉玲的住处比上述的要来得多。

事实上，林玉玲在 12 岁之前就已经搬过 4 次家，直到书写这部回忆录的时段为止，她搬家的次数已逾 20 次。林玉玲搬家的经验与一般人较为不同的是，她搬家后并不单与家人同住，而是时而借住于亲戚家，时而从一户与陌生人合租的公寓搬到另一户与友人合租的公寓等。综观林玉玲搬家的经验，从一开始的与家人、亲戚同居，到后来与外地友人、陌生人同住，至最后与丈夫儿子共建家庭，林玉玲确实经历了不少漂泊不定、“居无定处”的时光。

林玉玲的童年可说是在寄人篱下的生活中度过的，因此她对家充满着渴望与憧憬，渴望能够脱离贫困的生活，憧憬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若加以仔细观察，便可留意到林玉玲并不会称每个住处为“家”。回忆录中第一次出现“家”时，林玉玲是在描述着发生在祖父家的种种回忆。后来，林玉玲的父亲开了一家鞋店也随之拥有了属于他们家的房子，这不但是林玉玲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也是她第一次把一所住处称为家的地方。但好景不长，林玉玲只在这个家居住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就因为父亲破产而搬回了祖父家。期间，祖父过世了，而在出殡那天拍下的一张照片刚好捕捉了整个家族在送殡时的画面。这张照片把一个瞬间定格且永远保存了下来，它的存在与意义对林玉玲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宽宽平平的长方形照片把我捕捉在家族的心灵空间里，网在像血脉延伸、为数众多的堂兄弟姐妹之间，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短暂灿烂的历史”（林玉玲，2001：60）。此后，林玉玲就因为照片中所捕捉下来的时刻而认定了家在何方：“我知道马六甲是我的家；后来不论我去到哪里，这种感觉不曾再有……打从心里了解这就是家……在这以外的地方都成了异乡”（林玉玲，2001：60）。

林玉玲也曾住在三伯家，待林玉玲父亲找到了新工作以后，他们一家又搬到了三伯母家隔壁的木屋，但此时林玉玲的母亲已经离开他们到新加坡去了。林玉玲对这个新家表示：“有了自己的地方，我们又成了一家人，只是觉得这里比较像招待所”（林玉玲，2001：106），可见她在重获属于自己的家的同时，也开始对这个家带有一种“似家非家”的失落与矛盾，对家的定义更是有所动摇。

升上大学以后，林玉玲搬到了位于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宿舍里住了一年。次年，林玉玲与另一位大学女生在八打灵再也合租了一间房间。来到大学最后一年，林玉玲又搬回了大学宿舍。后来，林玉玲在伊克保的公寓与他同居、和卡尔靡以及他一群室友同住、在美国住进接待家庭、和来自加拿大的柯林肯夫妇合租房子、与杰若同住一户公寓、到学生宿舍住一个春假、住进路克的公寓、搬到城市宿舍当舍监、与爱丽丝和约书亚成为室友等，却从没把这些地方称为“家”。比如说，在学生宿舍里，她觉得那里让她感觉“有庇荫却没有家”（林玉玲，2001：250）。而在与爱丽丝和约书亚同住的时候，林玉玲有次偶遇三年前认识的朋友——沙玛，并把他请到自己的公寓来作客，但她心里的想法却是想让朋友“见识一下我在美国新建立，其实并不真实的‘家’”（林玉玲，2001：260）。从以上例子来看，林玉玲实际上并没有把这些住处当成家。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多年，直至林玉玲遇上查礼士，她在查礼士身上找到了归宿感，进而重新有了个家。她和查礼士一起搬进布鲁克林的一个公寓套房，尔后一起搬进三层楼的房子，这是她在美国建立的、真正的家。

余昭玟提出：“一个人可能居住过许多地方，但乡土对他而言，只有一处或二处而已，‘归属感’是一种重要的机制，藉着对环境的认识，产生出乡土

情”（余昭玟，2012：330）。林玉玲虽说曾居住过很多地方，但因为归属感的出现与存在，她心里认定的家乡并不仅限于一处，却也不是每一个落脚处都是家——估计这指的是童年时在马六甲的家以及与查礼士婚后居住的美国布鲁克林、威阙斯特郡和南加州。这些地方除了是林玉玲一生中的物质家园之外，也是前文中王欣所指的精神家园，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家。林玉玲曾说：“家乡有很多种，有的因为记忆成了家乡，有的因为有展望而成了家乡，然而对很多人来说，这两者并不相同”（林玉玲，2001：305）。她之所以会这么说，因为对她而言这两处家乡正正不是同一个地方，加上她本人亦从来未明确指定一处为唯一的家。故林玉玲实际上已间接透露了马来西亚是自己记忆中的家；美国则是自己长达成人之后有所发展的家。前者为其出生地与富有童年回忆的家乡，后者为其事业及婚姻萌芽发展的家乡。这两者对她来说都具有“家乡”的情怀，以致于她无法只选择一地为其家乡。

针对自己漂洋过海移民到美国的经历，林玉玲在回忆录中这么说：“即使逃离了第一故乡，奇怪的是新建的家园也只能当第二”（林玉玲，2001：46）。由此，读者除了能够再一次看见林玉玲自身也认为自己有两个家乡之余，也能看出两个家乡的首次之分。林玉玲接着解释新建的家园只能当第二的原因是“因为受制于婴孩时期的感官经验及对最初记忆的强烈情感，而无法落地生根”（林玉玲，2001：46）。从地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余昭玟认为孩童阶段是奠定故乡归属感基础最重要的时期（余昭玟，2012：330）。因此，林玉玲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却因为从出生至25岁到美国留学之前，是个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所以她对马来西亚的归属感尤其强烈。其实，林玉玲对家这个概念挣扎了许久，来到了回忆录的尾篇表示自己已经决定“不再守着记忆中的

家园不放”（林玉玲，2001：365），转而认为“家就是我们把故事说出来的地方”（林玉玲，2001：365）。林玉玲为回忆录的结尾写道：“在加州，我开始写有关美国的故事，也写马来西亚的故事。因为倾听、说出自己的故事，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林玉玲，2001：365），体现出了一种释怀以后的乐观与豁达。

许多学者在研究林玉玲《月白的脸》时，一般认为马来西亚对林玉玲而言就是“原乡”、“故国”、“祖国”、“家国”等，且不会特意表明美国在林玉玲心中是什么样的存在或是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可是，张锦忠在研究林玉玲的离散诗学时便指出林玉玲选择留居美国就是“把他乡当家乡”（张锦忠，2004：35）的举动。这种说法是少数在研究中表明林玉玲其实把美国也一并看作家乡的。另外，这部回忆录的书名里头似乎也藏有相关的伏笔，预示着林玉玲在这部回忆录中所写的“家乡”并不是针对唯一一个家乡而写的。林玉玲为这部回忆录取名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书名中的“Homelands”呈现的是复数的状态，所以从“Homelands”一词能够再次窥见她心中的家园似乎不仅仅是马来西亚一处而已，其实还包括美国。

吊诡的是，根据林玉玲在一次访谈中对 Mohamed A. Quayum 的回应，林玉玲亲自表示吉隆坡和加州对她而言都不是家乡⁸，纯粹因为她住在马来西亚也有大约 24 年之久，所以写作时大部分的想象一直并且会持续来自她在马来西亚的一些经历（Mohamed A. Quayum，2003：88）。虽然林玉玲如此坚定地否认了自己有“两个家乡”，但笔者从她回忆录中的家园书写可以明显感受到她把马

⁸ 林玉玲在访谈里的回答内容之原文为“Kuala Lumpur is definitely not my home turf, I am not delusionary. But neither is California.”

来西亚和美国都看作自己家园的倾向。或许林玉玲已经不愿意去指定一处为家，但潜意识里对两个家园的情感还是不经意地流露于文本之中了。

这些矛盾的情绪似乎已经点出了林玉玲对家园的一种心态，她好像已经倦于刻意地划分或确立一个地方的定义或地位。对此，张锦忠也表示：“在她内心深处，到底何者是分身，何者为本尊，到底有没有跨越什么疆界，还是从来就没有跨过去，恐怕仍然无法黑白分明地清楚厘定。也许我们可以指出，书写其实是林玉玲回返家国的方式，她藉由书写回返家园的空间与时间，描述马来西亚山河，回忆过去的岁月，像所有的流放作家一样，企图以文字再现永远存在的‘自己的家国’与国人”（张锦忠，2003：205）。

第二节 林玉玲《月白的脸》中的家园叙事

回忆录中的记载可以明显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是林玉玲由童年至少女时代的经历，后半部分是林玉玲于1969年马来西亚种族暴动“513事件”之后移民美国的故事。回忆录全文四部十一章，若是以篇幅来看，林玉玲较多着笔于述说童年以及成年的故事。通过她对自己一生的回忆与叙述，读者见证的是林玉玲一边成长一边成熟，一边摸索一边前行的生命历程。自童年至成年，从马来西亚到美国，林玉玲认为“不变的是叛逆的我”（林玉玲，2001：46）。的确，林玉玲的叛逆性格大大地影响着她的一生，但她的叛逆也随着她生命里的经历逐渐被消磨，后来还学会通过另一种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写作。

出生于马六甲的林玉玲在马来（西）亚度过了将近 25 年的时光。回忆录首五章主要记载的是林玉玲的童年回忆：三岁时在祖父家与亲戚互动的情景、五岁时第一次被父亲打、六岁开始到“教会学校”上学、八岁时经历母亲离开、十一岁立志当诗人、十二岁开始学了两年的芭蕾舞等等。回忆录中记载的第一个童年回忆是林玉玲在祖父家与母亲的互动。林玉玲回忆当时“还不记得说话，只记得感觉”（林玉玲，2001：46），但却已经“学会要去听母亲的话”（林玉玲，2001：47）。与一般孩童无异，年幼的她只会被动地去接受和经历生活，她叛逆的一面并未展现出来。那时候的她只会旁观着家里伯伯婶婶的外貌打扮、被别人嘲笑为“天生的多嘴婆”（林玉玲，2001：50）、在一旁观察总在做事的阿婶和她的女儿阿蓬、被父母带出去探访亲戚、被父母带到君王戏院去观赏午夜节目……她一直都顺从父母，由于年纪尚幼，对父母的安排和指示从来不会有所反对或反抗。但是，随着林玉玲逐渐成长，接触的人事物越来越多，她开始学会了叛逆和主动反驳，这种性格从她和她兄弟们的互动中开始变得显而易见。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林玉玲受尽兄弟们的排斥，于是她开始叛逆，“拒绝当女生……向男孩看齐”（林玉玲，2001：67），主动模仿她的兄弟一样“跑得快、从高高的墙跳下、骑脚踏车飞奔……很晚不回家”（林玉玲，2001：67）。六岁上学的林玉玲在学校里与修女老师们结下了爱恨难分的关系。林玉玲喜欢巧喜修女的温柔与亲切，却因为各种误会得罪了亚瑟修女、史恩修女、派翠西亚修女、彼得修女等人。当时的她相信自己会闯那么多祸是因为她“不懂得用沉默来保护自己”（林玉玲，2001：129），而且闯的祸其实都源于她的“不听话”（林玉玲，2001：129）以及她“顽劣的本性”（林玉玲，2001：

129），后来她甚至把“不听话”（林玉玲，2001：129）的行为与“坏”（林玉玲，2001：129）画上等号。

林玉玲当初被母亲抛弃之时，因为母亲的不辞而别，所以她只好自己设想几个有可能的理由：因为担心自己的身体会被家暴伤害而离开？因为丈夫破产而生活失去保障而离开？或是因为孩子们平时都忽略了她而离开？林玉玲最终还是不知道母亲离开的原因，也不曾问过母亲，在接受母亲离开一事上，她自始至终都是处在被动的境地。

在这部回忆录中，林玉玲对母亲的记叙其实蛮多，尤其是童年时期与母亲的种种回忆。由此可见，林玉玲童年时期的家园叙事经常包括家人，尤其是有关母亲的故事。一位母亲原来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灵魂人物。或许在林玉玲的眼中，母亲的形象正是如此，以致就算母亲离开了他们的几年之后，林玉玲是在父亲娶了二太太阿蓬的时候才真正发觉“母亲再也不会回来、日子永远不会像过去一样了”（林玉玲，2001：113）。这件事体现出了为什么她从来没觉得有必要称阿蓬为“妈”，因为阿蓬不是也永远不会是自己真正的母亲，所以她们之间的关系也只停留在“我们彼此视而不见……住在同个屋檐下，我不记得曾经和她说过话”（林玉玲，2001：113）。

在书写母亲的点点滴滴这方面，林玉玲是非常仔细的。在谈吐方面，母亲不但会不时责骂孩子们，还会议论他人的八卦，但林玉玲仍会觉得母亲“很有趣，也很机灵，即使说不雅的话也不失优雅”（林玉玲，2001：49）。在服装方面，母亲穿的纱龙可芭亚“像皇后的珍品”（林玉玲，2001：50），而且母亲还会像“美术馆每天更换展示品一样”（林玉玲，2001：50），天天换一套。在妆容方面，林玉玲觉得母亲经过打扮的脸会像天使般散发光辉、肌肤会像甜

美的果子，使母亲“宛若女神……像天神下凡”（林玉玲，2001：51）。在宗教信仰方面，林玉玲忆起母亲既会在神桌前对先祖“森巴扬”（林玉玲，2001：49），也会在家里“拿着香、晃着盘子……直到整个屋子都弥漫了烟乳香，布满了驱逐恐惧、痛苦和疾病的神灵”（林玉玲，2001：52）。在祖父家里面，林玉玲印象中的母亲与其他讲福建话的伯母婶婶不一样，感觉母亲只是个沉默的外人。其后，就算是母亲离弃了他们一家以后，林玉玲对于与母亲重逢时的画面以及接下来共处的四天依然是细心描述：和母亲到露天市场吃早餐、去拜访母亲的同事们以及兄弟姐妹、与母亲到商区逛街购物……，尽是美好的回忆。可惜，林玉玲第二次到新加坡去找母亲的时候发现母亲和一个华裔男人同居，母亲还对她要求只能把母亲称呼为阿姨，这时的林玉玲意识到自己和母亲多么疏远，自己原来想找回自己母亲的希望也就此破灭。回忆录结尾，读者可以清楚明白林玉玲不但对母亲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反而心中其实更希望能够在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多和她说说话，希望自己能从母亲身上学会倾听、学会宽恕。

谈及林玉玲被动的性格，林玉玲在十一二岁的时候，明显已经变成了较有主见的人。十一岁以前就立志当诗人的她，部分原因是因为阅读了出自布雷克的“一沙一世界”诗句，让她相信自己能够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转换成诗里的文字，所以她的志愿被牢牢地立定，以致“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这个愿望”（林玉玲，2001：136）。为了实现她成为诗人的志愿，她确实是付诸于行动去达成的，且在此领域中获得了国际上的肯定。回忆录末章，林玉玲忆起自己如何与诗结缘，表示自己因为写作而“知道我依然存在……写作让我想起过去，那感觉超乎安慰，这也是唯一让我继续活下去的方法”（林玉玲，2001：338）。纵然林玉玲长期处于一种漂无定所的状态，林玉玲是非常清楚知

道自己所要追求的是写诗、当诗人的，所以才会主动去实现这个志愿。林玉玲的坚持更突显写诗是她生命中那么多不确定的事她唯一肯定要去付诸实践的，也体现出对于诗，林玉玲是顺从的，不会想要以叛逆的性格去对待，展现出她对文学创作的热爱。

林玉玲 25 岁时做的一个决定成为了她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当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的林玉玲因为未能成功在本国大学申请教职，离开了马来西亚，到波士顿留学。林玉玲出国深造的另一原因是当时同居的男友伊克保因为曾留学美国，所以经常与她分享留美的经历，使她心向往之。除此以外，当时还身处马来西亚的林玉玲也因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动荡等各种原因使得她更想离开马来西亚。于是，她主动地作出了决定，离开了马来西亚到美国去。这么一个决定推动了林玉玲的去国离乡，预示着林玉玲与家园的关系会更加错综复杂的同时，也开启了林玉玲从另一方面对家园的认同。此外，这趟离乡背井到美国生活的时期正表现出了林玉玲开始告别她在过去所谓“叛逆”的性格行为。

林玉玲在回忆录的叙述当中多次提到自己离开了马来西亚到美国去以后就不会再回来的想法。她第一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是经历过马来西亚“513事件”后听到英文系的一位名叫蜜莉恩的研究生说：“我们马来人宁愿让马来西亚变回丛林，也不情愿给华人统治……我们不需要华人。要是没有华人，我们就得过着落后贫穷的日子，我也甘愿”（林玉玲，2001：223）。此番话让林玉玲“无法释怀”（林玉玲，2001：223）、“讶异”（林玉玲，2001：223）、“不能接受”（林玉玲，2001：224）、“木然”（林玉玲，2001：224），而面对着眼前的种族歧视与讽刺，林玉玲只能在心里默想“大概再也不会回到马来西亚了”（林玉玲，2001：224）。林玉玲第二次萌生这种念头的时候，她正

准备离开马来西亚，前往波士顿，却已在当下感觉自己是个“异乡人”（林玉玲，2001：227），心里默默决定“除非以一个过客的眼光，否则我再也不会再见到马来西亚”（林玉玲，2001：227）。除此之外，林玉玲也在回忆录中解释道：“我已经决定不回马来西亚，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是新政府颁布宪法，规定马来语是国语”（林玉玲，2001：295）。虽然林玉玲多次拒绝重返马来西亚，但这并不是基于对国家或家园的叛逆之举，而是因为她对国家感到失望才做出的决定。林玉玲最终还是于1974年回到马来西亚过了一个暑假，还表示对这一趟行程的决定是不假思索的，觉得“回家住生活一点压力也没有，心情很愉快”（林玉玲，2001：280）。此后，林玉玲常常回到马来西亚：1977年带着丈夫查礼士会马来西亚和家人第一次见面、1994年带着儿子重回马来西亚等，也会常常到新加坡去探望母亲。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年龄的增长，林玉玲对旧有的一些偏执也开始释怀了。

根据回忆录中的叙述，林玉玲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经常会针对家这个主题作出反思，可见林玉玲在这段时期确实对“家”的定义感到迷茫与无奈，才会不停反问自己，希望从中寻得一个答案。在回忆录当中，林玉玲自问：“人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家呢？”（林玉玲，2001：254）当时的林玉玲正与路克同居于比肯山上的一户公寓，而为了不让自己像是在路克家白吃白住，林玉玲坚持为路克买菜做饭、洗衣打扫。此时的林玉玲总结出自己若是想住在别人家里，就必须“让自己对别人有用才行”（林玉玲，2001：254）。同时，林玉玲对所谓的家，其实还是心中无数的，才会继续处于一种自我挣扎的状态，感觉自己“没有了家庭、社会，我像是不存在一样，虽生犹死”（林玉玲，2001：254）。在对“家”的反复纠结下，林玉玲进一步问出“人要怎样才算有个家？”

（林玉玲，2001：305）。对此，她认为“人对家的评价过高”（林玉玲，2001：305），解释道：“因为出生，可以把一个地方变成家乡”（林玉玲，2001：305）。由此，林玉玲似乎认为家乡之所以成为家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家乡的地位以及重要性在林玉玲的解读中受到了动摇，它在人们口中那神圣的地位似乎也只是人们强行赋予的，从中可知林玉玲对“家乡”的定义有一定程度的不解与迷茫。

离开了马来西亚到美国寻另外一个家的过程中，林玉玲在尝试融入社会的时候也曾面临各种障碍。在皇后学院任教时，林玉玲费尽精力与时间去阅读和批改学生们的作文，希望可以进而与学生们进行讨论和交流。但是，学生们对她的用心不以为意，林玉玲更是因此了解到学生们其实视她教的这门课作累赘。虽然这个情况让林玉玲深感不安、遗憾，但她选择了主动去跨越与学生的距离。于是，她效仿了其中一位学生——安琪拉的做法，把学生们都邀请到自己家里来。可惜，最后出席餐会的只有罗伯特和玛西两位学生。她的积极付出，不但得不到预期的回报，反而让她知道自己仍旧没学会如何在美国生活。

后来，林玉玲与丈夫一同搬入一间三层楼的房子，却被居住在对面出租公寓来自波多黎各的邻居，因为阶级不同的关系而“视为敌人”（林玉玲，2001：284）。打从一开始，邻居们就把林玉玲和丈夫的友善当作理所当然，总是在林玉玲家门前大声聊天、修车、四处丢弃啤酒罐。面对邻居的得寸进尺，林玉玲虽然深感不满，却一直努力做到接受与包容文化之间的差异。因为这些冲突，林玉玲虽然恨极了邻居的所作所为，但同时更“气自己竟然那么恨他们”（林玉玲，2001：290），且“担心自己有种族歧视”（林玉玲，2001：290）。终

于，在社区的联谊派对上，他们的关系才稍有好转，往后的日子里他们的关系就仅此于偶尔的点头打招呼。

就叙事内容的侧重点而言，林玉玲虽是作家、研究学者，但回忆录里较多叙述的是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而非创作过程或研究过程。根据匮乏经济学的说法，“匮乏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通常所认为的‘消瘦’和‘萎缩’，有时却反而是‘肿大’和‘膨胀’”（转引自张闳，2000：76），正因为林玉玲与家园的关系一直处于迷惘的状态，所以她在书写回忆录时更为时常叙说有关家园与生活的故事。她说的故事，全都是有关家的故事：离家的故事、寻家的故事、归家的故事。林玉玲经历了离家——寻家——归家这个过程，家园意识无疑是缠绕着她的一生，所以即使她一度处于无家的状态，她生命中最纠缠不清的就是与家园的关系。若从叙事的角度出发，张琼惠就曾指出书中的某些篇幅除了在叙事以外，同时也在分析和检讨这些事情。对此，林玉玲也十分认同，表示自己在书写回忆录的后半部时的确较重于抽象性的思考、剖析（张琼惠，2001：217）。

第三章 林玉玲的离散经历与多重身份

林玉玲的离散经历对于她的身份建构起着决定性之作用。首先，李有成曾经这样解释离散的概念，指出：

“离散之所以为离散是因为存在着两个‘中心’。一个是离散的始源，也就是家国——相当于英文的 *homeland*，包括了家园、部族、国家或国族国家等。另一个是居留地，也就是离散社群赖以依附并形成网络的地方。”

（李有成，2010：31）

此外，李有成还引用了柯立佛“根”（*roots*）与“路”（*routes*）的概念来论述以上“两个中心”的说法，并加以说明“根”属于家国，属于过去与记忆，属于有朝一日渴望回归的地方；“路”则属于居留地，属于未来，导向未知（李有成，2010：31）。因为离散就介于这两个中心之间，所以林玉玲一边经历离散，一边与在过去和未来的两个中心进行对话，其身份则是在不同的对话过程中建构起来。

根据翟晶对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的研究所得，他在解释霍米·巴巴的学说的基础上总结出：“身份是一种异源集合体，它并不是人们生而固有的东西，而是在历史、文学、科学、神话等众多文本中被建构出来的。因此，身份是就

特定条件进行认同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固定的，而是临时和变易的”（翟晶，2013：19）。在林玉玲的身上，其身份的多元性是异常明显的。通过出生、教育、移民、婚姻等生活经历，林玉玲的身份也随之建构起来，但也随之经历瓦解以及重构的过程。以下，笔者将以血缘、族群与国别身份以及附属身份等方面探讨林玉玲多元身份的建构和变化。

第一节 林玉玲的血缘、族群与国别身份

参照霍米·巴巴对身份的解释，在林玉玲的身上便可验证“身份是一种异源集合体”的说法，因为她的身份正正集合了多方的影响，包括祖父、父母、以及一些个人经历。林玉玲的祖父来自中国福建，到了马来亚便是马来亚华侨。林玉玲的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马来亚人，但前者是华人，后者是娘惹。因此，林玉玲是第三代马来亚华侨，是一位华人父亲与一位娘惹母亲的后代，也是福建人。可是，这一点就有别于霍米·巴巴认为身份不是人生而固有的说法，因为林玉玲的这种身份不但不在于她的操控范围之内，它还是她与生俱来的血缘身份。除了是一个人生而固有的身份以外，血缘身份更是一个固定的、无法变易的身份。

另一个不在林玉玲掌控之内的身份，是她的名字。不同的是，名字不是她与生俱来的身份，而是一个她被赋予的身份。名字伴人一生，是一个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说是一个人的代表。林玉玲在《月白的脸》序言里曾解释自己名字的由来：

“姓名中最重要的是放在前面代表家族的姓：‘林’。……我名字的第二个字是‘玉’，代表辈分，祖父家每一个孙女都叫‘玉’，这样一来，大家就知道我是族里的第三代而且是女孩。‘玉’是中国福建人最常取的女孩名。”

（林玉玲，2001：36）

除此以外，林玉玲也记载了祖父之所以会为她取名“林玉玲”，其用意是希望她“谦逊自持、平凡过日、与人无异”（林玉玲，2001：36）。由此可见，一个名字在代表家族的姓氏、家中辈分和性别的同时，也蕴含着长辈的心意，这种种都在建构着一个人的身份。而父亲以三〇年代影星雪莉邓波儿（Shirley Temple）的名字为林玉玲取的英文名 Shirley 则在建构林玉玲身份的另一部分。因为一个名字，林玉玲身上就此结合了中西两方的元素。这种中西文化的结合再次体现出林玉玲的身份是由异源结合，从来都不是单一的。

上述的血缘身份和姓名身份均不为林玉玲所掌控，但两者对林玉玲身份的建构并不能被忽略。可是，林玉玲其实在童年时期已经开始质疑自己的身份了。当时仅有 8 岁的林玉玲，因为母亲离家出走而经历了身份上的改变——她变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女孩。回忆录中叙述道：“在荷兰街住了几个月，越来越觉得觉得自己是没人要的孩子”（林玉玲，2001：93）。其后，林玉玲还诉说道：“而且后来，我竟发现自己不受欢迎”（林玉玲，2001：94）。对于一个小孩，被抛弃、被孤立的感觉是如此可悲、绝望。在文本中不难发现林玉玲多次提到

“我到底是谁”（林玉玲，2001：101）这种疑问，从而得知她对自己的身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很可惜地，这种自我质疑并没有随着时间逝去，反而是愈加深厚，造成她在族群和国别两方面都曾经历身份建构、瓦解、重构的过程。

就族群身份而言，林玉玲首先面临的是福建人和娘惹这两者的冲突。虽然林玉玲是福建人，也是娘惹，但从文本中可见她更倾向于母亲所讲的峇峇马来话。对比福建话和峇峇马来话，林玉玲对福建话便显得非常厌恨，说：“我对福建话从来就没有感情，没有亲切感，也没有家乡的感觉。这好像对南洋老家的感觉，即使我在那儿出生，福建话却把那里变成异乡”（林玉玲，2001：48）。不仅如此，林玉玲也因为觉得福建话“刺耳”（林玉玲，2001：47）、“絮絮叨叨”（林玉玲，2001：47）、“霸道”（林玉玲，2001：48）而排斥福建话。反之，林玉玲觉得母亲用的语言“听来如瀑布淙淙，像浸淫于旋律之中”（林玉玲，2001：49），尽管语言中不时也会“不雅”（林玉玲，2001：49）、“猥琐”（林玉玲，2001：49）、“邪恶”（林玉玲，2001：49），但始终还是觉得它“活泼”（林玉玲，2001：49）、“有趣”（林玉玲，2001：49）。林玉玲对福建话的反感与抗拒让她的语言的程度在五岁以后就再也没有进步过了，只懂得一些简单的单词。相反地，因为林玉玲与母亲交谈时使用的语言是马来语，所以林玉玲不说福建话，反倒说峇峇马来话。到了六岁的时候，林玉玲开始在英国学校上学，此后英文成为了她最常使用、最流利的语言，让她“像小雨滴重回河川、像鱼重回江海”（林玉玲，2001：48）。在接受殖民教育的情况下进而学习英文在林玉玲的身份层面上加入了殖民属性，促使了她多重性身份的建立。此外，林玉玲家里的手摇式留声机、进口杂志、好莱坞明星照片等，都透露了西方文化如何无声地影响并塑造着林玉玲的身份，

以致她在往后求学、教学、写作、研究的时候都应用英文，逐渐地失去了她身为华裔马来西亚人的语言属性与族群身份。

其次，林玉玲在建立她的族群身份时所面对的是种族歧视的问题。林玉玲在大学当助教时，适逢英文系征聘讲师，但课业成绩最好的她并没有如期被录取。反之，学校录取的是一名回教男性。事后，林玉玲从一位客座教授的口中得知，她之所以没被录用是因为校方听说林玉玲是个“冥顽不灵的女人”（林玉玲，2001：219），这使林玉玲感叹道：“在马来西亚，我的性别、种族永远不对”（林玉玲，2001：219）。林玉玲的身份再次受到打击，让她看清社会的不公平，也促使了她对离开马来西亚到美国深造的决定更加坚定。但即使到了美国，种族歧视并没有消减。如在工作环境里，她“棕褐色的皮肤、亚裔的长相”（林玉玲，2001：276）使她在面试的时候总是抱着“冀望自己有机会填补别人挑剩的空缺”（林玉玲，2001：276），也使她的学生不信任她的教学能力、她的同事将她排挤在外；她在公园带着孩子玩耍时，受到其他白人妈妈的冷眼对待等。这些歧视的眼光既让林玉玲陷入被边缘化的状态，也促使了林玉玲的族群身份濒临崩溃。

若从国别角度出发，林玉玲首先面对的是从马来西亚迁徙到美国时遇到的国别身份认同的建构。乍到美国的时候，林玉玲经常感觉自己不属于这块土地，也曾利用“客人”（林玉玲，2001：262）、“局外人”（林玉玲，2001：262）、“游魂”（林玉玲，2001：262）等词语来比喻移民到美国的外地人，只是过了一段时间，林玉玲仿佛成功利用工作上的忙碌与疲惫，让自己忘记身为异乡人的感觉。林玉玲后来是在丈夫查礼士的身上找到了归属感。林玉玲与查礼士于1972年11月结婚，并于1980年生下儿子革舜。早在怀孕期间，林玉

玲已然决定“把自己当成美国人，并且开始申请公民资格”（林玉玲，2001：310）。就在怀孕四个月的时候，林玉玲通过了考验并得到了美国的公民权。此时的林玉玲感觉自己“再也不是流浪者”（林玉玲，2001：312）。因为孩子的出生，林玉玲更是在政治上成为了真正的美国人。林玉玲就此跨越了文化之间的差异，建立了新的跨国别身份——亚裔美国人。

重观回忆录的名称，林玉玲其实早就埋下一个小小伏笔，巧妙地将自己一直处于与四周围格格不入的形象嵌入书名中。书名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意为身处白人之中，而小标题 *An Asian-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 中则突出了亚裔美国人的概念。这么一来，一位置于众多白人之中的亚裔美国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显得林玉玲格外不同。由此，林玉玲在表达身处异乡的她有多么与众不同，多么与四周围的人事物对立的同时，其实也在表示自己虽然在政治上成为了美国人，却永远都无法成为属性上和文化上真正的美国人。

在林玉玲产下儿子革舜后，她尤其希望儿子有归属感并能确定自己的家乡是何处。她希望儿子“就像我小时候，有极短暂的时间，清楚自己是华裔马来西亚人一样”（林玉玲，2001：314）。此外，她也曾言：“我希望我的孩子有福气认同这片土地、确立自己的身分，就像我年轻时在马来西亚的情况一样”（林玉玲，2001：310）。以上，林玉玲在告知读者她曾经也笃定地知道并相信自己是一位华裔马来西亚人之余，也间接透露出她在往后的生活对自己身份的质疑越来越深。

在回忆录中，林玉玲曾言：“我自己的国家拒绝让我这样的人把那里当作家乡，讽刺的是，在美国这样原本禁止像我这样的人进入的土地上，我竟然发现自己在这里建立了家园”（林玉玲，2001：363），从中感受到林玉玲对马来

西亚失望又心痛，但同时也包含了她对美国的感激。在为自己建立身份的过程中，马来西亚多次局限了她身份建构的发展。例如，当时的马来西亚文学只指以马来语书写的作品，所以即便是林玉玲的诗集获得了国协文学奖，因为诗集是以英文创作出来的，林玉玲也曾担心自己的书不会为官方所接受、马来西亚会不承认她的成就。或许就是因为经历过这种伤害，林玉玲的身份几近崩溃。但是，尽管美国给予了她一个机会，她最终感叹道：“纵使埋在美国生涯的点点滴滴当中，生命中非美国的我依然存在”（林玉玲，2001：46），看得出林玉玲在国别身份的层面上，还是会面对“两个我”的疑惑。后来，林玉玲常常“觉得自己跟马来西亚的土地很亲”（林玉玲，2001：331），两者的地位又似乎呼之欲出。

林玉玲受访时曾表示自己在完成了回忆录的第二部分时的感想是：“嗯，我的确是美国人”（张琼惠，2001：223），但这可被理解为林玉玲在国别身份上认同了美国公民的身份，精神上却依然把马来西亚视为家乡，足以再次突出离散对林玉玲身份的多重性之作用与影响。

第二节 林玉玲的附属身份

林玉玲的附属身份包括她的女性身份、社会身份以及文化或职业身份。接下来，本文将就以上三种身份论述林玉玲如何一一建立起她的身份以及其中所面对的难题。本文也希望能够通过分析文本去探讨林玉玲如何跨越身份认同上的重重困难。

身为女性，林玉玲在性别身份上也经历过一段身份认识与建构。由于母亲在自己 8 岁的时候已经离开了身边，自己又是家里的独女，林玉玲的生命中似乎缺少了女性的模范，以致她常常被“我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林玉玲，2001：171）、“该如何长大成为女人？”（林玉玲，2001：171）等问题所缠绕，可见她在性别属性方面还是挣扎了一番。她所纠结的不单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位女性，也纠结于如何改变大众对女性的定位。当大众对女性必然成为家庭主妇的刻板观念无法转变，她不停思考着的是该怎么活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女人”（林玉玲，2001：171）。

另一方面，林玉玲在青春期时也曾渴望得到爱，于是她尝试与男生交往。在经历了与伊恩、瑞杰、班和休兹先生的肤浅交往，她被伊克保所吸引，欣赏他的内涵，享受着和他一起时单纯又随遇而安的生活。可是，和伊克保在一起的代价就是得成为一个“忙着端沙拉、甜点……收盘子、补充酒水”（林玉玲，2001：214）的家庭主妇。伊克保还要求她，若他母亲到自己的公寓来，就得立刻搬走。林玉玲无法忍受伊克保认为女性就必须做家务的这种想法，以致后来伊克保向她求婚，她也拒绝了，因为她不想成为伊克保的眷属、附庸。由此，林玉玲的身份不停在建构，也不停在变化。她开始越来越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追求的目标——深造以及在大学教书。她深知伊克保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给她行动上的自由，却又有无法给她成长、长进的机会，于是她选择了忍痛离开。后来，林玉玲受到友人爱丽丝的影响而开始觉得“女人在社会中是无法单独生活的”（林玉玲，2001：263），她并没有因为经历了与伊克保的感情关系后而从此讨厌男人或认为自己一生不需要再依靠男人，相反地，她意识到女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需要男人的，因此她不排斥依靠男人，也不排斥结婚。或许，我

们只能说林玉玲当时没有接受伊克保的求婚，是因为还未遇上像查礼士那样能给她带来归属感的人。

在美国这个地方，林玉玲开始建构了她身份的另一面。在美国，她一步一步地成为一位大学教授、妻子、母亲……她的职业方面和社会方面上的不同身份共同建造了一个她。大学教授的职业身份是她努力得来的。到了美国求学，她一直为学业奔波，在完成了硕博士论文后，她到皇后学院当助教的同时寄出了一封又一封的求职信，希望能够求得教职。最后，她到了位于的布朗克斯区南部的哈斯特司社区学院（Hostos Community College）教书。往后的日子里，林玉玲到了纽约附近的许多学院任教，甚至还到国立新加坡大学当客座教授。

针对妻子与母亲这两个社会身份，林玉玲也不是草率决定去背负的。林玉玲在遇见查礼士之前，与多位不同种族、不同职业身份、不同地位的男性交往过，当中让她爱过痛过。与此同时，她因为经历了孤独一人的煎熬，所以最终决定要结婚。虽然她是这么决定了，当然也不是随意妄为，而是在布兰岱斯大学的第二年认识查礼士并确定想与对方共度一生后才结婚的。就这样，林玉玲成为了一名人妻。婚后 8 年，她诞下了儿子革舜，晋升为母亲的角色。从少女到人妻再到为人母亲，尽管身份和责任多了，林玉玲始终坚持创作与研究，成为了第一位赢得国协文学奖的亚裔女性以外，也在学术界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可惜，当她回到新加坡教书的时候，报刊媒体感兴趣的不过是她身为妻子和母亲的女性身份，而非她身为诗人、学者的身份。林玉玲对此感叹道：“不管早先我如何努力奋斗、在事业上出人头地……我竟然无可避免、无从选择的就变成一个‘女人’”（林玉玲，2001：323），也看得出林玉玲对于他人无视了她的一切努力而只把她牢牢定位成“妻子、母亲、胸脯”（林玉玲，2001：324）

等女性身份的确感到非常不满。这种强制定位想必也在无形中促使林玉玲对自身身份形成矛盾。

由此可见，林玉玲在跨国别、跨族群身份的基础上，还必须在不同文化观念中，尝试面对她作为女性、妻子、母亲、学者、诗人等各个角色的考验。在这一段过程中，离散的经验与她的多重身份息息相关：这一经验有效推动她去跨越矛盾、冲击、纠结等，进而使其得以建构自己的身份。

第四章 结语

本文以“家园书写”的视角对林玉玲《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作诠释，通过细读文本去理解林玉玲对家园的定义、论述回忆录中的家园叙事以及探讨林玉玲经历离散过后多重身份的建构。经过这一系列的探究，笔者认为林玉玲的人生经历和身处的时代背景是影响着她与家园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元素。根据上文针对林玉玲如何定义家园的论析中，林玉玲在精神上的家园并非仅限于任何一处——马来西亚或美国，反之，两处地方因为不同的原因都成为了林玉玲心目中的家园。纵使许多研究者并不侧重于论及林玉玲是否拥有两个家园，笔者从林玉玲的搬家经验、家园情怀的产生以及移民至美国等方面，整理出林玉玲对家园立下定义的一个过程。

回忆录中的家园叙事的内容可以分为四大类：亲人、教育、个人性格和精神寄托。林玉玲在回忆录中大篇幅地述说着有关父母、兄弟、亲戚等亲人的故事，从服装打扮、言语谈吐至行为举止等再现他们在林玉玲回忆中的样貌。林玉玲在回忆录中也细述自己在英殖民教育下的种种状况，从中揭露了英殖民教育如何在无形之中摧毁了马来西亚人固有的文化。读者也可以根据回忆录的情节叙事，明白到林玉玲从小叛逆的性格所经历的蜕变过程，进而去讨论林玉玲如何从写作寻得人生中的精神寄托。

在身份建构层面上，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林玉玲的血缘身份并不受她的离散经验所影响，因为血缘身份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改变。可是，林玉玲的离散经验

促使了她在族群身份、国别身份、女性身份上都面临一次又一次地变换。张锦忠提出英文及华人身分在充满敌意与本土主义的国家的处境是造成林玉玲选择另一个身份的属性的原因。而另一方面，故国家园往往又是背井离乡者渴望回返的“母体”，尽管这个家国也曾经是局限的施受者（张锦忠，2003：193）。因为离散的经验，林玉玲确实经历过重重难关，多次遭受身份濒临崩溃的打击，也常常因此处于矛盾纠结的状态。虽说她总在马来西亚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徘徊，但她最终也逐渐认识了自己，能够为自己取得一个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每个人的身份都会具有双重性或多重性，但在林玉玲身上较为与众不同的多重身份可见于她跨国别又跨族群的身份。经历离散而得以定位自己的林玉玲，或许能够为其他马来西亚华人起到启示作用，鼓励着人们在困境中也必须抱有希望，努力地逆势成长。限于篇幅，本文无法深论《月白的脸》中林玉玲的女性主义。

1996年，52岁的林玉玲终于完成了这部回忆录。根据张琼惠与林玉玲的访谈内容，林玉玲清楚地道出了书写回忆录的目的：

“我会说主要的动机就是要写华裔马人，这样华裔马人以后才能了解他们过去的遭遇……我要写回忆录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在马国已居住了好几世代，他们是如假包换的马来西亚人，没有理由承受不公平待遇。”

（张琼惠，2001：219）

这部回忆录的意义非凡，因为书写的出发点并非为了自己，作者从未想过由此将自己的生命历程记叙下来向众人炫耀，甚至曾经担心书写回忆录似乎是“家丑外扬”的一种方式。此外，林玉玲也强调自己在书写回忆录时还会经常把自己的回忆与史料对照，追求的正是能够“非常确定无人能质疑其中历史的正确性”（张琼惠，2001：217），可见《月白的脸》也是基于反映现实中的历史事件而写的。

在访谈之中，作者透露自己是希望能够借这部记录历史的回忆录向众人分享有关身为亚裔美国人的事迹。回顾历史，祖辈因生活、经济所迫而离开中国来到南洋，如今林玉玲因为政治和文化等因素，而选择“再移民”到美国。虽然两者都是选择放弃公民身份、跨越国界，移民他乡，但是两者的动机不一样。从林玉玲的角度出发，这部回忆录的另一个作用或许就是为当时的马来西亚人发声，为那些同样受过英殖民教育的人、经历过“513事件”的人、离散在外的华人、对身份产生怀疑的人等，利用自己的文学平台为他们发声。从马来（西）亚华人的角度来看这部回忆录，或许可以从中了解马来西亚的一段历史及其意义。

对于现代马来西亚人来说，林玉玲在回忆录里提到的种种问题，包括政治方面、种族方面、性别方面等，至今仍未解决。除此以外还有随之而来的不公平待遇、矛盾和压力——若一个国家一直存有这些困境，则是否预示着将来还会有其他“林玉玲”会出走他乡呢？

参考文献

书籍

1.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译（2006），《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 翟晶（2013），《边缘世界——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3. 黄锦树（1990），〈“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初论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载于张永修、张光达、林春美（主编），《辣味马华文学：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论性课题文选》（3-17页），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4. 李有成（2010），〈绪论：离散与家国想像〉，载于李有成、张锦忠（合编），《离散与家国想像——文学与文化研究集稿》（7-45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 林玉玲著、张琼惠译（2001），《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台北：麦田出版社。
6. 童庆炳编（2003），《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7. 张锦忠（2003），〈跨越半岛，远离群岛——论林玉玲及其英文书写的漂泊与回返〉，载于王德威（主编），《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191-205页），台北：麦田出版社。
8. 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编（2008），《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雪兰莪：大将出版社。

期刊论文

1. 邓全明（1998），〈个人写作与代言人写作——陈若曦小说创作的双重品格〉，《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3期，页47-50。
2. 林加乐（2003），〈马英文学管窥〉，《蕉风》，第490期，页114-125。
3. 林加乐（2003），〈马英文学管窥（下）〉，《蕉风》，第491期，页55-67。
4. 余昭玟（2012），〈记忆与地景——论屏东小说家的在地书写〉，《屏东教育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类》，第38期，页321-346。
5. 张闳（2000），〈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当代作家评论》，第5期，页73-88。
6. 张锦忠（2004），〈流动与游离，或，交换与改变（之必要）：林玉玲的离散诗学〉，《中外文学》，第32卷第10期，页25-40。
7. 张琼惠（2001），〈林玉玲访谈录〉，《中外文学》，第29卷第11期，页212-241。

8. 朱雯娟（2009），〈林玉玲《月白的脸》中回忆录的书写是社会空间的产物〉，《高雄师大学报：人文与艺术类》，2009年第27期，页1-14。

学位论文

1. 王欣（2016），《论萧红的家园意识》，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海南师范大学，海口。（未出版）

访谈

1. Quayum, M., & Lim, S. (2003). *Shirley Geok-lin Lim: An Interview*. MELUS, 28(4), 83-100. doi:10.2307/3595301